

ZHEJIANG CETYAO YUANLIUSHI

全国艺术科学「九五」国家年度课题

浙江歌谣源流史

朱秋枫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省社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浙江歌谣源流史

朱秋枫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歌谣源流史/朱秋枫编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3

ISBN 7-80518-953-6

I. 浙... II. 朱... III. 民歌-文学史-浙江省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4372 号

浙江歌谣源流史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俞驾征

封面设计 张大鹏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305(千)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18-953-6/I·757

定 价 23.00 元

序 言

吕洪年

早听说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朱秋枫先生在退休离岗之后的古稀之年,还笔耕不辍,在精心撰著《浙江歌谣源流史》。这消息令我振奋不已,并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因为朱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同行学者之一,他是对歌谣研究有素的民间文艺家。还在我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他所采录的歌谣(1956年他出版《浙江民间歌谣散辑》,1987年又出版《浙江民间歌谣》),熟悉他的名字,颇为敬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起在《山海经》刊物的编者与作者圈中以文会友,彼此相识相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受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之约,转请先生为他主编的《民歌格律》一书撰写论文,承他慨然应允,并且完成得十分出色。……想不到两个年头,一部30多万字的《浙江歌谣源流史》书稿便送到了我的手上,更令我瞩目。我在翻阅之后,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为我文化大省的建设填补了一项空白。承他对我推重,在此书出版之际,嘱序于我。我对此道并不内行,但还是不揣浅陋地写上几句,权以为序。

在我国文学史上,凡谈到歌谣时,有所谓“楚歌”、“蔡讴”、“吴歈”、“越吟”等名称。它们是按照歌谣产生和流传的地区来划分的。这些都是我国起源很早的歌谣,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今天我们所说的浙江歌谣,其源盖出于古老的“吴歈”、“越吟”,而成为吴越歌谣的重要部分。

传说周朝时候,周太王的两个儿子为避让王位,从渭水之滨,南奔“荆蛮”,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自号句吴,这就是周代吴国的始祖。他们把北方善歌的风习带到南方,始与“南国之风”的“越吟”相交融,便成为吴越歌谣。

吴越歌谣的这个名词,虽然不是指歌的品种和形式,但却是歌谣中一个有独特含义的概念,是一定地区的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风格的歌谣,整个长江三角洲特别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和特点,为吴越歌谣尤其是浙江歌谣独特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

从地理环境上说,这个地区处于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沿岸,大部分地方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点。它既不同于北方平原地区,也不同于西南高原地区。自然条件造成人们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爱好风尚。因此有学者认为吴越歌谣产生于山柔水丽、地灵人杰的江南,这里土质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文化悠久,是一个得天独厚、非常理想的好地方,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者也。这里的风光、习俗、语言、情调等形成了传统吴越歌谣的独特风格:凄怨之声中带有婉转,柔丽情调中含有清秀。

从生活特点上说,这一地区的人民特别富于对故土的眷恋。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氏族集群,他们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较早地进行农耕和养殖,制陶与雕刻,热爱乡土和田园,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劳动方式、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因此吴越歌谣与荆楚西声(长江中上游地区)不同,它们多富家庭温馨情调而少贾人远游思归的情绪。

从方言语音上说,在这个地区内,虽然还有许多语音上的差别,但在整体上,却是基本一致的。许多语汇、语调、土音这地方有,那地方也有,形成了一个语言上的共同特色,即吴语方言,其中多音节词特别丰富,虚词和语助词多样而又多变,有自己特定的组词习惯,特别是“吴依软语”,委婉动听,形容描述具体而

细致。

历史上“吴歈”与“越吟”的交融和合流，便形成自成体系、具有独特风格的吴越歌谣，古书上统称为“吴歌”。虽然对吴歌的采集和研究历代不乏其人，如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就保留了南朝许多真正的民歌《吴声歌曲》，唐诗中的五绝形式就受到过它的影响。又如明朝时期，冯梦龙的《山歌》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吴歌辑集，全书十卷，300多首。当时不少先知都曾倡导开一代诗风的民歌。可以说，明代是民歌发展的一个高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历程，应该是：诗经、楚辞、汉赋、古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民歌和小说）。再如“五四”前后时期。这一时期的真正开始是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集近世歌谣，并且成立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1926年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出版，发生了重大影响。顾颉刚还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吴歌研究的专著《吴歌小史》。正因为“五四”以来对歌谣的重视，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很快就成为党用以教育、宣传群众的有效武器，不但鲁迅写了民歌体的诗，而且瞿秋白主编的党的机关报《热血日报》发表了不少搜集和创作的民歌。但回顾这一段历史就可发现，对歌谣历来是采集多于利用，借鉴多于理论上的研究。

其实，歌谣研究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个文艺学问题，还同时是个民俗学和社会学问题。就文艺学的角度讲，歌谣不仅与许多民间艺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对历代文人的诗词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就民俗学的角度讲，早期的歌谣记录，突出了歌谣的立体性，与歌谣的演唱背景，诸如节庆、祭扫、婚丧、集会、结拜等实际生活的研究有关。近世歌谣与“启蒙”并提，一场自上而下的歌谣运动带动一大批地方上的知识分子对“家乡民俗的研究”，并认为歌谣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就社会学的角度讲，歌谣可以成为思想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正如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教授在杭州大学中文系

讲学时所提到的论文《吴歌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就是把吴歌作为经济史的资料来用而所取得的成果。他说：“明清时期的经济史，主要是研究吴越、江浙一带的经济状况，这一时期的材料当然可以从其他文献中得到，但在吴歌里面，同样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比一般的文献资料更可贵。”（见拙著《江南口碑——从民间文学到民俗文化》一书“代序”）

由此可想，朱先生的这部《浙江歌谣源流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改变了歌谣研究冷寂与贫乏的局面，而且还以其活生生的事实，显示出学者们认为当今最该挽救和最该弘扬的东西是什么。其所论的虽然仅限于吴越歌谣组成部分之一的浙江歌谣，但由于其古代的、近世的和当代的，均有一定的全国影响，所以它也便具有了一定的跨越地域的意义。

读了这部书稿，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继承与创新相益彰。本史稿对前人研究的成果多所吸取，搜集资料之广与涉猎古籍之多，表现出作者治学的勤奋和严谨。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对前人成果的梳理、鉴别和取舍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先秦越歌析疑》一节，对古歌谣的产生年代与辑入古籍的时间差问题的分析与判断，很有道理，令我赞赏，说明口耳相传的“传承力”是惊人的。这里，珍贵的史料为新见奠定基础；独特的新见使珍贵的史料增色生辉，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微观与宏观相辉映。本史稿对每首歌谣的微观研究体察入微，并作了全方位、多功能的分析与评论，说明作者有较好的治学功底和素养，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总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来考察，提出一定的宏观见解。如《颂歌，从〈禹上会稽〉到〈毛主席最公平〉》，就是从历代流传的一首首颂歌中概括出产生颂歌的根本原因，认为是以“为民办实事的活生生的功绩为依据”，这也是历代颂歌之所以流传不衰的原因所在。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提供典型的实例；宏观研究为微观研究作

了高度的提炼和概括,两者虚实相间,巧妙结合。

三、溯源与循流相纵横。这部书稿在体例上的显著特点是:上编以断代“歌谣评介”为纲,中编以历代“歌种嬗变”为纲,下编以当今“地方特色”为纲,从不同角度审视浙江古今歌谣,也较别致。全书稿的重点显然是博古详今,并且列举大量普查所得的最新资料,使浙江歌谣的横断面大于纵剖面,重点不同,容量有别,更让人得益不浅。

综合地说,这部史稿在体例上与一般的史稿有所不同,它不以一般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为自己的范式,而是以探索歌谣“源流”关系为自己的重点和主旨。我们对待史书传统的态度是:既不一成不变地因袭,也不视而不见地全盘抛弃,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全书所举的歌谣实例较多,引用时在适当地方交代了选取标准和选用原则,从而避免了举例有某种随意性的嫌疑。这是因为作者厚积薄发的缘故。作者以毕生的精力采集歌谣,而在暮年完成一部洋洋大观的史学之作,这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事,窃以为这一宝贵的做人与治学经验,也很值得称道。

2003 年元月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目 录

序言	吕洪年(1)
绪言	(1)

上编 溯源编——浙江历代歌谣述评

第一章 先秦之越歌	(9)
第一节 先秦越歌之概况	(9)
第二节 先秦越歌记录之难	(14)
第三节 先秦越歌析疑	(17)
第四节 先秦越歌的艺术特色	(27)
第五节 从先秦越歌探浙江歌谣之源	(34)
第二章 秦汉之越歌	(40)
第一节 秦汉越歌之概况	(40)
第二节 两首秦时谣的历史回眸	(44)
第三节 三首秦汉越歌产生年代辨析	(48)
第四节 汉《会稽童谣》与《会稽童谣歌》	(54)
第五节 借鬼言情的《陈阿登歌》	(59)
第三章 六朝之浙江歌谣	(63)
第一节 六朝浙江歌谣之概况	(63)
第二节 《前溪歌》和《阿子歌》的历史价值	(68)
第三节 《天目山诗》与杭州山水形胜	(73)
第四节 《山阴民谣》与《民为谢灵运谣》的对比	(77)
第五节 南朝二谣讖意剖析	(80)

第四章 隋唐五代之浙江歌谣	(84)
第一节 隋唐五代浙江歌谣之概况	(84)
第二节 解读《杭州民谣房使君》	(89)
第三节 “伪献谣”的历史裁判	(91)
第四节 《吴越王还乡歌》不同记载比较	(95)
第五节 《陌上花开》歌词寻索	(101)
第五章 宋元之浙江歌谣	(105)
第一节 宋元浙江歌谣之概况	(105)
第二节 射向偏安君臣的一支支“讽”箭	(113)
第三节 《建炎后俚语》的深刻含意	(117)
第四节 《壁上谣》所展示的历史背景	(120)
第五节 造反歌,元代浙江歌谣的主流	(125)
第六章 明清之浙江歌谣	(129)
第一节 明清浙江歌谣之概况	(129)
第二节 《富春谣》与《朱血谣》的血泪控诉	(143)
第三节 明代歌谣中的清官武将、名士贤达	(148)
第四节 《委巷丛谈》中的杭州吴歌	(153)
第五节 《喜鹊歌》与庄舄越吟一脉相承	(157)
第六节 关于《狸斑童谣》的历史演变	(160)
第七节 指名骂王朝,清代浙江歌谣的一大特色	(165)
第八节 此起彼伏的清代造反歌	(169)
第九节 反帝歌,清末浙江歌谣中的号角	(174)
第十节 清末救国歌的继承与创新	(178)

中编 循流编——浙江主要歌种流传轨迹

第七章 浙江时政歌流传之轨迹	(189)
第一节 颂歌,从《禹上会稽》到《毛主席最公平》	(189)
第二节 讽刺歌,从《鸟散弓藏》到《钱权交易》	(194)
第三节 抗争歌,从《军士离别词》到《保卫新昌》	(202)

第四节	警示歌,从《太湖神歌》到《厂房顶上乌鸦叫》	(209)
第八章	浙江劳动歌流传之轨迹	(216)
第一节	工匠歌,从《作弹歌》到《龙门桩》	(216)
第二节	农耕歌,从《射的山谣》到《致富谣》	(222)
第三节	船歌,从《七里滩谚》到《金塘谣》	(229)
第四节	蚕桑歌,从《逍遥独桑头》到《养蚕歌》	(235)
第五节	茶歌,从《赞日铸茶》到《龙井碧玉尖》	(241)
第六节	渔歌,从《越人珠谚》到《舟山渔歌》	(248)
第九章	浙江情歌流传之轨迹	(257)
第一节	爱慕歌,从《越人歌》到《床头开着茉莉花》	(257)
第二节	热恋歌,从《陈阿登歌》到《恋妹实在是艰难》	(262)
第三节	相誓歌,从《千载寄汝名》到《来结郎同年》	(266)
第四节	相思歌,从《黄葛结蒙笼》到《五更等郎》	(270)
第五节	劝喻歌,从《莫作流水心》到《同心歌》	(274)
第六节	离别歌,从《候人歌》到《送郎去南洋》	(279)
第十章	浙江其他歌谣流传之轨迹	(285)
第一节	礼仪歌,从《越谣歌》到《让路歌》	(285)
第二节	风物歌,从《越人土风歌》到《曹娥孝女庙》	(294)
第三节	妇孺歌,从《采葛妇歌》到《有爹有娘珍和宝》	(303)
第四节	时令歌,从《四时令》到《新农事歌》	(310)

下编 遗韵编——源远流长话当今

第十一章	当今浙江歌谣的地方特色	(319)
第一节	越中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	(319)
第二节	杭嘉湖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	(330)
第三节	浙赣皖交接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	(337)

第四节	古瓯歌与浙闽交接地区歌谣的地方特色	(342)
第五节	古老淳朴、别具一格的畲族歌谣	(347)
后记		(361)
附录:参考文献及书目		(365)

绪 言

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有两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一是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祝》传说和被誉为“坚贞爱情”化身的《白蛇传》,均产生于浙江,占了“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的一半。二是被誉为“最古的歌谣”《作弹歌》和《击壤歌》,也首先记录、流传于古越大地。特别是民间歌谣,作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也与大禹治水“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有关。所以人们常说,浙江是民间文学的富矿区。

古今浙江歌谣极为丰富,之所以丰富的原因有三。一是越国子孙素来擅长歌吟。“吴歈越吟”曾辉煌于广袤的吴越大地。在浓重的歌吟氛围中,浙江历史上也曾产生过不少善歌者。有姓名可查的,除作离国哀歌的越王夫人和“王者歌手”钱镠外,还有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的汉曹娥之父曹盱、晋嘉兴牧鸭女阿子、在洛阳街头唱“越歌三章”的越人夏统、擅唱《望夫歌》、《柳枝词》的唐代名伶刘采春母女、宋代台州营妓严蕊、元代“盲而善歌”者钱塘人骆生、明代越人胡温、清代畚族歌手蓝三满等,不一而足。二是浙江地处东南要冲,得天独厚。春秋越国时风云际会,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古歌。东汉会稽郡治自吴(今苏州)移至绍兴,名士辈出,民尚风骚,也萌生了许多歌谣。五代吴越王保境安民,歌声传扬于阡陌间。南宋建都临安,浙江不仅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成了包括歌谣在内的舆论中心,史载的歌谣有几十首之多。明清两代,大运河及三江流域的民歌小调、时令杂曲,数量惊人,有“不问男女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

喜听之”之载。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浙江又成了反帝歌谣和反清鼓动歌谣的大本营,《醒世歌》、《最新妇孺歌》大量印行。三是自古以来,浙江出了一大批珍视民间歌谣的文人学士,如汉的赵晔,晋的沈充、干宝,唐的张志和,五代的罗隐,元的叶子奇、陶宗仪、杨维祜,明的田汝成、郎瑛、谈迁,清的朱彝尊、李渔、范寅、魏兰,直至近、现代鲁迅、周作人、姜子匡、刘大白、艾青、陈学昭。在人才因素上,也可说是个优势。

最为可贵的一点是:浙江古今歌谣的采录者,一向重视歌谣的科学性,即民间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对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民众自有公评,这是基本的。但民意的差异,也因时间、地点、社会利益、群体认识的差异而普遍存在着。文史书上对南朝谢灵运的文才多有赞赏,但民间却有《民为谢灵运谣》的讽刺歌在流传。宋代方腊起义军横扫浙中时,民间传颂甚多,但绍兴城因太守刘𢆶坚守而未被攻破,因有《越民为刘𢆶谣》的颂歌记于南宋《嘉泰会稽志》上。以《台温处树旗谣》为代表的元代造反歌十分盛行,但《两浙輶轩录》中却记有一首《滴水湾父老歌》,颂扬了元朝忠臣泰不华进剿方国珍而捐躯的壮烈行为。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军进驻浙江时,各地都有一些《迎天兵》一类的歌谣出现,但也有“长毛来了苦煞人,未知苦到啥光景”^①的贬歌流传至今。直至当代的《大跃进谣》、《权钱交易谣》、《不正之风谣》,可谓真正的有美有刺、有褒有贬、有正有反,直抒出人民之心声。这种客观的、多样性的歌吟之声,为浙江古今歌谣,增添了奇光异彩。

尽管浙江歌谣的历史遗产十分丰富,为后世留下了可作借鉴的研究资料,但对浙江古今歌谣作较全面、较系统的汇集评介时,尚有一些界限方面的问题,须“界说”在先。

一、古越歌与浙江古歌之界说。古越歌中极大部分歌谣,就

^① 全歌见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平湖县卷《长毛山歌》。

萌生和流传的地域而论,可称得是地道的浙江古歌,如《采葛妇歌》、《越王夫人歌》、《军士离别词》、《乐师畅辞》、《胜吴祝词》等。但追念远古时代大禹功绩的几首传说歌如《涂山歌》、《候人歌》、《禹上会稽》以及地域范围超出今浙江版图的越族先民流传下来的歌谣如《越人歌》、《越人土风歌》等,则应属古越人的歌谣。确切地说,古越歌和浙江古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理由是:尽管古越人分居地域极广,但其根基及主要聚居区和迁移的出发点,依然是以会稽山脉和三江流域为中心的越中地带。因此,将古越人传承之歌和外迁越民吟唱之歌,从广义上界说为浙江古歌或越族先民之歌,也是符合情理和历史真实的。“浙江”二字作为固定的地域名称虽始于唐代,但自东汉顺帝将会稽郡治永久性迁至山阴,并经东吴在古浙地增设为六郡四十四县之后,浙江的地理概念已经形成,民俗文化现象也有确切的地域可查,如《前溪歌》、《阿子歌》之原出于德清、嘉兴。故本书将六朝前的浙江古歌一概列为“越歌”,而自六朝始称“浙江歌谣”。此举目的,既为了说明古越歌谣与浙江歌谣有别,又为了突出浙江歌谣是承袭于古越歌这一源头的。

二、诗、歌、谣、谚、俚语之界说。《诗经》以前,诗即歌。《诗经》以后,歌谣与诗词虽有分别,但民间歌谣仍泛称为诗。如著名长篇民歌《孔雀东南飞》序中有“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之句。《乐府诗集》辑有大量古代歌谣,均归于“诗集”范畴之内。民间歌谣为诗、赋、词、曲之母。民间歌谣的“四性”,即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是在传承中体现出来的。没有民间口头上的传承,就形成不了真正的歌谣。因此,民间歌手传唱的诗、歌、谣,包括有明确原作者的古歌,如东周·卫庄姜的《燕燕》、战国·韩凭妻的《乌鹊歌》、晋·王献之的《桃叶歌》等,均已得到公认。浙江古歌如《吴越王还乡歌》、《天目山诗》、《富春谣》,亦应归属此例。

至于歌谣与谚语、俚语之界说,就较为困难了。古人记录民

间韵句时,除称“歌”、“谣”、“谣歌”外,还记作“谣谚”或“俚语”,这在中国歌谣史上是较难作明确界定的一个问题。如屡见于古书上的汉代《会稽射的山谚》,而明·杨慎《哲匠金桴》中却记为《会稽谣》。又如歌颂东汉会稽太守张霸的《会稽童谣歌》,晋·张华《广博物志》中记为《会稽童谣歌》,而晋·陈寿《益都耆旧传》中却记为《会稽民为张霸语》。又如明末流传于杭州的《杭城灾荒谣》,史学家皆引为“谣”,而《二申野录》却记为“谚”。又如《衢州驿舍诗》、《建炎后俚语》二歌,《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均引为优秀歌谣。由此可见,这诗、歌、谣、谚、俚语五种记法,笔录者往往即兴而定,没有严格的界定。古人云:“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谚,俗之善谣也。”“夫歌,本韵语也。”^① 尽管有些谚、俚语与歌谣相近,但一般谚、俚语与歌谣毕竟是有区别的。歌谣的形式特征我简述为“成歌句、可诵唱、具韵律、合篇章”十二个字。故本书拟作如下界说:凡符合上述形式特征的谚、俚语,列入歌谣范畴,也是合适的。

三、歌谣类别之界说。歌谣分类,一向视为难事。古人有按地域分类的,如吴歈、越吟、赵讴、楚风等等。也有按歌唱者从业之不同而分的,如渔歌、樵歌、田歌、船歌等。今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编发的《民歌的分类》,按歌谣内容和特殊功能,分为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儿歌等七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可分为若干小类,如劳动歌中可分工匠歌、农耕歌、养殖歌、船歌、渔歌等等。而养殖歌中又可分放牧歌、茶歌、蚕桑歌等等。时政歌中可分颂歌、讽刺歌、抗争歌、警示歌等。情歌中又可分赞慕歌、热恋歌、相思歌、离别歌等等。而实际上,民间歌谣的类别是十分繁杂的,特别是有一些歌谣包涵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生活劳作特色,又有或诉或怨、或悲或喜的感情色彩。如《采葛妇歌》,它既是一首妇女生活歌,又像一首劳

^① 以上三语均见《古谣谚·集说》。

作歌,又含有时政歌的色彩。又如《作弹歌》,它既是一首狩猎歌,又是一首描写制作弓箭的工匠歌,又似乎含有守孝歌的色彩。又如汉代的《射的山谣》和唐代的《七里瀨谚》,它们既是地方风情歌,也是农耕歌和船工歌。近至清代的《神女谣》,明显是一首情歌,但也可作为农耕歌。鉴于此,本书在界说歌谣类别时,既参照集成总编委有关规定,又尽力做到客观全面。特别对非单一属性的歌谣,在分类上不作局限,以示该歌谣内容上的丰富性。

除三点界说外,还须对古诗的产生年代作些说明。古人称歌谣为“风”,有来去无踪之意。特别对远古和上古歌谣的产生年代,很难作出科学的判断。但作为歌谣源流史,又必须对古诗作出产生年代的认定,否则就难与历史民俗现象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为审慎起见,本书将远古、上古越歌的产生年代均表述为“据传产生年代”,以利于继续探索。

在篇目编排上,本书上编将就浙江历代歌谣作纵向的综合介绍,期能使读者全面了解古越歌和古代浙江歌谣的概况,并就一些须加探讨的问题,在有关章节中加以评述。所列历代主要歌谣下限至“五四”,与集“五四”以后浙江歌谣的《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和集“五四”以后浙江民歌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相衔接。本书中编将就浙江主要歌种作比较研究,其目的在于探索出主要歌种流传嬗变之轨迹。本书下编将着重论述当今浙江歌谣的不同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特别对古老淳朴、别具一格的畲族歌谣作较为详尽的介绍。

总的说来,展示浙江历代歌谣及其源流史迹,论述当今浙江歌谣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是一项探索性、尝试性的工作。书前作此赘言,意在求教于大方,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